

ISBN4-907676-32-8

日本思想文化研究

第八期（2006 年 12 月）



明代中日私人贸易船印

（167cm×95cm 日本广岛县立博物馆藏）

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

编

日本思想文化研究

第八期

主 编：王 勇

编委会：王 勇 王宝平 水口干记 江 静 陈小法 郭万平

责 编：华瀛历史文化研究室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邮编：310012）

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内

<http://www.zdrbs.com/abc/hystudy/Index.html>

E-mail: japanology_ch@msn.com

出版发行：[日]国际文化工房

（日本东京都江户川区平井 5-22-9 田中大厦 3F）

版 次：2007 年 1 月 31 日第 1 版

国际书号：ISBN4-907676-32-8

目 录

卷首寄语

中日之间的“距离” 王 勇 (1)

获奖论文

日本对吴越国外交的实态以及日本自体中心的“华夷秩序”的营构···刘恒武 (3)

国学与近世日本人的文化认同·····向 卿 (13)

武士道精神与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胡 澎 (20)

关于日本甲午战争文学的研究·····翟文栋 (27)

从一封文书看室町将军的求经路·····董 科 (35)

专题研究

论中国人应该撰写一部《日本汉文学史》·····陈福康 (39)

当代中国的“文化”涵义·····小熊旭 (46)

日本开国与中国人·····邢永凤 (53)

『類聚国史』に見る渤海の沿革記事について·····李美子 (61)

我体验的日本企业文化·····宋 翔 (71)

资料信息

露中日研究者モスクワ交流会に出席して·····王宝平 (76)

径山对外交流史年表·····陈小法 董 科 (78)

日本文化研究所 2006 年大事记·····编辑部 (89)

补白：足利义满像 (38) 封面小识 (77)

卷首寄语

中日之间的“距离”

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王 勇

我不是地理学专家，也不懂测绘技术。本文所要讨论的“距离”，只是一个历史概念，或是一种心理尺度。

中国与日本究竟相隔多远？查阅古代文献，《汉书》模糊地说在“乐浪海中”，《后汉书》具体到“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乐浪（今朝鲜）距中原还有好几千里，所以在古代中国人的世界构图中，日本列岛隐现在缥缈的天涯海角。

远不可及的距离感，给人施展遐想的空间，衍生出种种幻觉。《说文解字》提到东方“有君子不死之国”，接着引孔子的话说：“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意思是在中原不能实现理想，干脆乘船出海移居“九夷”。

孔子憧憬的“君子不死”理想王国位于“九夷”，而据皇侃的《论语义疏》，所谓“九夷”指东方的九个民族，其中包括“倭”（日本古称）。波澜壮阔的“徐福东渡日本”传说，大抵在这种背景下敷衍而成。

中国习称日本为“扶桑”、“东瀛”、“方壶”等，意思都是仙人所居的海外神山。直到清朝末年，现代科技知识已经比较精确地测定中日之间的距离，但大多数士大夫依然雾中看花般地认知日本。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叹息，中国文人视日本“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这种朦胧的距离感，把日本虚化为世外桃源，妨碍中国人认识真实的日本，危害不可谓小。

然而，历史上中日之间也有过几次近距离接触。明朝时，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宣称吞并大明、坐镇宁波。明朝出兵援朝，经过短兵相接，往昔令人向慕的“神仙”一变而为毛骨悚然的“怪物”。翻看明代传奇《斩蛟记》，丰臣秀吉被描绘成头似巨钟、赤发披面、双目喷火的巨蛟，即可为一证。

元明之际，倭寇跳梁，频频出没东南沿海，在民众中造成空前恐慌。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倭寇图卷》与北京国家博物馆藏《抗倭图卷》异曲同工，栩栩如生地描绘倭寇航海而

来、登陆望风、抢掠村庄、与明军交战、官军获胜的过程。画中的倭寇下身赤裸、光头跣足、肩扛刀枪、身缠斑衣、面目狰狞。

明人郑舜功在《日本一鉴》中提到一本叫《海乱鬼录》的奇书，解释海乱鬼是“倭海鱼名”，人们用以指呼“倭贼”。《运步色叶集》载：“海来乱鬼……亦作鲛。”据1603年的《日葡辞书》，“海乱鬼”读作 Cairagui，“似鲛之鱼”，是一种皮呈梅花斑的食人鲨鱼。抗战时期，中日生死肉搏，“海乱鬼”定格为“鬼子”，日本人被彻底妖魔化了。

回顾中日交往历史，日本离我们太远，超出正常的视觉距离，容易被虚化为神仙；日本离我们太近，甚至引起肢体摩擦，常常被异化为鬼怪。好比用望远镜瞭望，模模糊糊地产生海市蜃楼的错觉；如果拿显微镜观察，局部的瑕疵会被无限扩大。谚云：“远看似朵花，近看全是疤。”中日之间远近距离错位，正应此验。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双方都面临重新调整焦距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日本人是文明、修养的化身，日本产品是先进、科技的典范，这是长期闭门锁国造成的另一种高不可及的距离感；近些年来，网民仇日情绪高涨，街头抗日游行失控，“鬼子”的鄙称死而复活，则是全球化过程中两个民族再次摩肩擦踵导入的误区。

庄子曰：“君子之交淡如水。”中日两国的交往需要一个适度距离，焦距调大了模糊，焦距调小了障眼；谦卑地仰观对方难窥全貌，傲慢地俯视对手易失准头。日本人非神非鬼，当他以正常人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眼前，双方四目相对，产生一种微妙而陌生的距离感：既相认同又互排斥。

我们在许多方面摩擦，而在更多的领域合作，难道这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吗？

获奖论文

日本对吴越国外交的实态 以及日本自体中心的“华夷秩序”的营构

——兼议日本“中华意识”的确立与巩固

宁波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刘恒武

一、引言

论及历史上日本与吴越国的外交往来,国内外学者大多认同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的观点,认为日本对吴越的外交主要以左、右大臣与吴越王之间书函往来的形式展开,而且在日本朝廷与吴越政权交往的过程中,与日方的消极、冷淡态度形成对照,吴越国采取了积极主动、不拘礼次的外交姿态¹。关于双方态度“一冷一热”的原因,按照木宫泰彦的解释,当时的吴越国不过是僭号称王、偏居一隅的地方割据政权,吴越国王与日本朝臣通函酬对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木宫氏还推断,吴越国对日积极展开外交的实际目的在于获取贸易之利。日本学者森克己则认为,当时日本对海外交往态度趋冷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国民的文化自觉和独立自主精神的增强,另一方面则在于贵族阶层消极孤立、自我封闭的对外观念的形成²。关于吴越国王与日本朝臣互致书函的政治意义,国内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这实际上意味着吴越国王承认了己方的臣属地位³。

然而,关于日本与吴越之间的外交往来的探讨,似乎并不能就此划上句号。首先,目前该课题研究可以依据的资料仅有《日本纪略》、《本朝世纪》和《本朝文粹》等日本单方面的文献记录,这些日本文献的记载在中国文献中均找不到相关的对证。其次,这些文献的内容本身亦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其中,《日本纪略》和《本朝世纪》的相关记载寥寥数言、语焉不详,而《本朝文粹》仅收录了藤原实赖和藤原师辅给吴越王的两封答书的原文,关于书函撰写的经纬和背景则无任何注记。资料的状况决定了该课题的探讨尚有相当大的存疑空间,木宫泰彦对于日本与吴越政权交往状况的线条清晰、轮廓圆满的勾画实际上夹杂了不少主观性的笔墨。此外,吴越国王与日本朝臣之间通函,并不一定意味着两者相互承认了外交

※ 本论文系浙江省教育厅高校青年教师资助项目“唐至宋元时代浙江与日本海上交通的研究”(2004906)成果之一。

¹ 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流史》三、五代·北宋篇—第一章。东京:富山房,1955年。

² 森克己:《日宋贸易的研究》第二编第一章,国立书院,1948年。

³ 何勇强:《论吴越国的海上外交》,《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王心喜:《钱氏吴越国与日本的交往及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身份的对等,在此,还必须认真探讨吴越国王发往日本的书函的格式,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弄清日本和吴越彼此之间的外交态度十分重要。姑且搁置吴越国对日外交的真实姿态不论,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日本通过己方左、右大臣与吴越国王的书函往来,达成了一种合乎自身礼秩要求的外交形式,而这也是8世纪以后日本力图构建本国至上的“华夷秩序”这一历史文脉的延续。下面笔者想就拙见进行具体论述。

二、关于日本左、右大臣与吴越王通函的始末

弄清日本朝臣与吴越王之间书函往来的肇始以及书函致答的顺序,对于了解双方的外交姿态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查阅有关文献,就会发现木宫泰彦的有关论述存在着很大问题。木宫氏在《日华文化交流史》一书中讲到:吴越王首次向日本遣使是在朱雀天皇承平六年(936),该年七月十三日大宰府报告了吴越人蒋承勋、季盈张等的到来,当时承勋是奉吴越王钱元瓘使命而来,八月二日左大臣藤原忠平致书吴越王¹。木宫氏依据的是《日本纪略》承平六年七月十三日条和八月二日条,这也是目前所知关于此事的唯一文献依据,其原文如下:

(承平六年七月)十三日己亥,大宰府申大唐吴越州人蒋承勋、季盈张等来著之由。十四日庚子,大纳言正三位兼行右近卫大将藤原朝臣保忠薨。廿八日甲寅,於紫宸殿相扑召合。廿九日乙卯,追相扑。八月二日,左大臣(忠平)赠书状於大唐吴越王。十九日乙亥,以左大臣藤原忠平朝臣任太政大臣,摄政如元。²

这里,第一个疑问是蒋承勋等人此次来访的身份是否确为吴越王的使者,上述记载对此并无说明,蒋承勋本是往来于吴越与日本之间的商客,曾于承平五年(935)九月抵日“献羊数头”³。而大宰府奏报蒋承勋等人到来之事本身,也不一定意味着蒋承勋等人此行负有某种特殊使命。众所周知,从9世纪中期起,日本对外民间贸易均由大宰府统一管理,其贸易场所设在大宰府鸿胪馆,公元926年平安京朝贡贸易随着渤海国的灭亡彻底终止以后,大宰府鸿胪馆成为日本对外贸易的唯一管理机关,所谓“鸿胪馆贸易”一直持续至11世纪中期。在鸿胪馆贸易中,日本政府原则上的管理程序是,首先“大宰府言上商客着岸之由”,即先由大宰府向中央政府奏报大陆商船的到来,朝廷接到报告之后,向大宰府派遣一名藏人和一名出纳,检明外国船的积载货物并行使先买权⁴。因此,承平六年七月十三日大宰府的奏报,从文献字面的意思来看,只不过是太宰府一次普通的例行报告而已,奏报行为本身并不能表明此次来访一定具有官方性质。

第二个疑问是蒋承勋等人此次是否携有吴越王的函件,文献对此亦无任何记载,只记有八月二日左大臣藤原忠平“赠书状於大唐吴越王”,而书函本身已佚,其内容不得而知。仅凭这条记载,我们很难推定藤原忠平的这封书状就是对吴越王来函的答书,相反,从文句中“赠书状”⁵的字面意义来看,事实更可能是藤原忠平主动致书于吴越王。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木宫氏将936年吴越海商蒋承勋等人的抵日视为一次官方来访、并

¹ 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流史》三、五代·北宋篇—第一章,富山房,1955年。

² 《日本纪略》承平六年七月十三日条至八月十九日条(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十一卷),国史大系刊行会,1940年。

³ 《日本纪略》承平五年九月条。

⁴ 森克己:《日宋贸易的研究》第一编第四章第三节,国立书院,1948年。

⁵ 亦有版本作“赐书状”。

将其作为双方书函往来的端由，其推断显然已经超出了现有文献所能论证的范围。下面，我们还有必要对以后历次书函致答的经纬进行一番梳理：

根据《日本纪略》的记载，朱雀天皇天庆三年（940）七月“□□日，左大臣（仲平）赠书状於大唐吴越王”¹。这是继936年左大臣藤原忠平致函吴越王之后日本左大臣又一次的致函，其书状内容不传。该条记载的前后无任何说明性的文句，似乎同样是单方面的“赠书状”，并非答书，而且迄今尚未发现任何文献表明936年至940年之间吴越王曾向日本左大臣复函或赠书，《本朝世纪》记载了天庆元年（938）蒋承勋再抵太宰府进行交易一事，但并未言及承勋携有吴越王的信函或负有官方使命。²因此，关于936年至940年之间日本朝臣与吴越王的书函往来和官方联系，根据现有文献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日本左大臣曾两次致函吴越王。

天庆八年（945）六月，吴越客商蒋袞、俞仁秀、张文过等人抵日，事见《本朝世纪》³，此次来访亦无任何外交目的。村上天皇天历元年（947），蒋袞再次抵日并携来吴越王钱佐的书简。此事的文献根据是载于《本朝文粹》卷七的《为清慎公报吴越王书》，《为清慎公报吴越王书》即大江朝纲为藤原实赖（清慎公）撰写的致吴越王的答书，但是《本朝本粹》并未介绍书状起草的经纬，亦未收载吴越王发来的书简，因此，相关背景只能通过《为清慎公报吴越王书》书函本身的内容了解，其原文如下⁴：

为清慎公报吴越王书 加沙金送文 后江相公

蒋袞再至，枉一札开封捧读，感佩骇怀，笔语重叠不异面展，幸甚幸甚。袞等，逆旅之间聊加慰问，边城程远，恐有疏略。今交关已毕，归帆初飞，秋气凉，伏惟大王动用兼胜，即此其祖遣，又所惠土宜，有憚容纳，既恐交於境外，何留物於掌中，然而远志难拒，忍而依赖，别赠答信，到宜收纳。生涯阻海，云涛几里，南翔北向，难付寒温於秋鸿，东出西流，只寄瞻望於晓月，抑去四月中，职升左相府，今见封题，在未转前，左右之间，愿勿迟疑，勒袞等还，不宣谨言。

天历元年闰七月廿七日

日本国左大臣藤原朝臣

吴越殿下谨空

沙金貳佰两

右甚虽轻微，当土所出，聊表寸心，谨状。

天历元年闰七月廿七日

信函首句云：“蒋袞再至，枉一札开封捧读，感佩骇怀”，可见蒋袞此行的确带来了吴越王的函件，这实际上是目前文献可以确认的第一封吴越王发往日本的书简。藤原实赖书函文末还有“抑去四月中，职升左相府，今见封题，在未转前，左右之间，愿勿迟疑”的语句，据此可以推定，吴越王的书简确是发给藤原实赖的，而且起草书简时尚未得知天历元年（947）四月藤原实赖由右大臣升迁为左大臣之事。根据现有文献所反映的状况来看，吴越王的这封书函很可能是对之前日方两次致函的回应，在此，令人费解的是：936年和940年日方的致

¹ 《日本纪略》天庆三年七月条。

² 《本朝世纪》天庆元年七月廿一日条和同年八月廿三日条（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九卷），吉川弘文馆，1964年。

³ 《本朝世纪》天庆八年七月廿六日条。

⁴ 《本朝文粹》卷7（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二十九卷下），吉川弘文馆，1965年。

书名义人均左大臣，而947年吴越王钱佐的书函却避开左大臣，发向了位低一等的右大臣，这似乎有悖常理。其实，大略考察一下936年至947年之间日本朝内大臣的人事变动，就会找到问题的答案。

公元10世纪，日本政治形态由律令政治转变为摄关政治，摄政、关白掌握政务实权，摄关一般由律令制太政官系统中权位最高的太政大臣或左大臣出任。根据《日本纪略》的记载，承平六年（936）八月“十九日乙亥，以左大臣藤原忠平朝臣任太政大臣，摄政如元”¹，承平七年（937）正月“廿二日乙亥，以右大臣从二位藤原朝臣仲平为左大臣，以大纳言正三位藤原朝臣恒佐为右大臣”²。由此可知，藤原忠平于936年由左大臣升为太政大臣仍兼摄政，为群臣之首，937年藤原仲平和藤原恒佐分别升任左、右大臣总理诸般政务。左、右大臣之间是有着明确的位秩之别的，左大臣在太政官系统中地位仅次于太政大臣，居于右大臣之上。937年升任左大臣的藤原仲平与摄政藤原忠平同为平安时代权倾一时的大贵族藤原基经之子，仲平系忠平之兄。翌年天庆元年（938）五月“五日辛亥，右大臣正三位兼行右近卫大将藤原朝臣恒佐薨”³。天庆七年（944）“四月九日辛亥，以大纳言正二位藤原朝臣实赖任右大臣”⁴，藤原实赖是太政大臣藤原忠平的长子，是时，朝中要职尽归忠平一门。其后，天庆八年（945）九月“五日戊戌，入道左大臣藤原朝臣仲平薨”⁵，关白太政大臣忠平亦一再卧病⁶，具体政务的主管权开始转移到时任右大臣的忠平长子藤原实赖之手。天历元年（947）四月廿六日，天皇“以右大臣（实赖）任左大臣，以大纳言藤原师辅卿任右大臣”⁷，藤原师辅是忠平之子、实赖之弟。天历三年（949）八月忠平故去⁸，至此实赖作为朝政主导者的地位正式确立。

吴越王钱佐的书函应该撰写于蒋袞启程前不久，关于此次蒋袞的出航时间，对照前次天庆八年（945）的出航时间来看，也应在天历元年（947）三、四月之间⁹。此时，天庆八年（945）左大臣藤原仲平去世以及实赖开始负责具体政务的消息，应该通过天庆八年（945）抵日的吴越客商蒋袞等人或者其他渠道传到了吴越国，而实赖升任左大臣则因为是天历元年（947）四月的新闻，吴越王起草书函之时尚未获悉。因此，我们可以推知，吴越王钱佐的这封书函本应发给曾经致函己方的日本左大臣，由于天庆八年（945）九月至天历元年（947）四月之间左大臣一位虚缺，而发给了当时实际主理政事的右大臣实赖。

天历七年（953），蒋承勋带来了吴越王钱俶致日本右大臣藤原师辅的书函，菅原文时于当年七月为师辅起草了答书，此事仅有《本朝文粹》卷7收录的《为右丞相赠大唐吴越公书状》原文作为文献依据¹⁰。钱俶的书函内容不存，书函往复的背景亦无从推考。天历三年（949）八月忠平去世之后，关白、太政大臣之位虚缺不置，分任左、右大臣的实赖和师辅两兄弟执掌朝中大权。吴越王钱俶致书右大臣师辅应有其个中缘由，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吴越王与左大臣实赖同时亦有书函联系的可能性。《为右丞相赠大唐吴越公书状》原文如下：

¹ 《日本纪略》承平六年八月十九日条。

² 《日本纪略》承平七年正月廿二日条。

³ 《日本纪略》天庆元年五月五日条。

⁴ 《日本纪略》天庆七年四月九日条。

⁵ 《日本纪略》天庆八年九月五日条。

⁶ 《日本纪略》记载藤原忠平于天庆七年（944）十月、天庆八年（945）三月、天历元年（947）正月三次卧病，无法理事。详见《日本纪略》天庆七年十月廿四日条、天庆八年三月廿三日条、天历元年正月十二日条。

⁷ 《日本纪略》天历元年四月廿六日条。

⁸ 《日本纪略》天历三年八月十四日条。

⁹ 《本朝世纪》天庆八年七月廿六日条。根据记载，蒋袞等人该年“三月五日始离本土之岸”。

¹⁰ 《本朝文粹》卷7（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二十九卷下）。

为右丞相赠大唐吴越公书状 管三品

蒋承勋来投传花札，苍波万里，素意一封，重以嘉惠，欢惕集怀。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锦绮珍货，奈国宪何。然而志绪或织丛竹之色，德馨或引沈檀之薰，受之则虽忘玉条，辞之恐谓嫌兰契，强以容纳，盖只感君子亲仁之义也。今抽微情，聊寄答信，以小为遗，到愿检领。秋初，伏惟动履清胜，空望落日，长繇私恋而已。勒丞勋还，书不尽言，谨状。

现有文献中没有 953 年以后吴越王与日本左右大臣书函往来的记录，但是可以肯定吴越与日本的政治交往仍在持续。《日本纪略》天德元年（957）七月廿日条和天德三年（959）元月十二日条记载：“大唐吴越国持节使盛德言上书”¹，两条记录的语句雷同，木宫泰彦也认为这很可能是对同一事件的重记。这里的“书”应该是递交给天皇的，而非左右大臣。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有确切文献记载的日本左、右大臣与吴越王的通函状况列表如下：

年代	书函发出者	书函接收者	传书者	文献依据
936 年	日本左大臣藤原忠平	吴越王钱元瓘	蒋承勋等	《日本纪略》承平六年八月二日条
940 年	日本左大臣藤原仲平	吴越王钱元瓘	蒋承勋？	《日本纪略》天庆三年七月条
947 年	吴越王钱佐	日本左大臣藤原实赖 （书状封题为右大臣）	蒋袞	《本朝文粹》卷 7 《为清慎公报吴越王书》
947 年	日本左大臣藤原实赖	吴越王钱佐	蒋袞	
953 年	吴越王钱俶	日本右大臣藤原师辅	蒋承勋	《本朝文粹》卷 7 《为右丞相赠大唐吴越公书状》
953 年	日本右大臣藤原师辅	吴越王钱俶	蒋承勋	

三、关于吴越对日外交的姿态与目的

以上分析了日本左右大臣与吴越王通函的起始和“书函外交”的过程，指出了木宫氏旧说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应该强调的是，根据目前文献，我们还无法判定 936 年至 940 年之间吴越王是否曾向日本遣使或致书，而日本左大臣在这期间两次致书吴越王却是肯定的。木宫有关日本与吴越之间的“书函外交”肇始于吴越王于 936 年遣使日本的论点缺乏文献依据。相反，如果仅以现有文献而论，双方的“书函外交”更可能始自日本左大臣向吴越王的主动致函，947 年吴越王钱佐的书函则应该是对日本左大臣来函的回应。参看上表可知，有史可征的日本执政大臣向吴越王的致函达到 4 次，而吴越王向日本左右大臣的致函仅有两次。由此，我们不得不怀疑目前学界有关吴越对日采取了主动、积极的外交态度的论断。

那么，吴越王与日本左右大臣书函往来是否一定意味着两者相互承认了外交身份的平等呢？答案是否定的。在五代之前的唐代，唐朝皇帝亦常常致书周边诸国的辅臣。例如，陆贽

¹ 《日本纪略》天德元年七月廿日条和天德三年元月十二日条（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十一卷）。

在贞元二年（786）曾为唐德宗起草过《赐吐蕃将书》¹和 3 封《赐吐蕃宰相尚结赞书》²，白居易在元和二年（809）至元和六年（811）任翰林学士时曾为唐宪宗起草过《与吐蕃宰相钵阐布书》³、《与南诏清平官书》⁴、《与吐蕃宰相尚绮心儿等书》⁵。唐帝致书诸蕃朝臣这一行为本身并不包含特别的外交礼仪意义，皇帝与受书者的外交身份关系通过文书的用纸、书头、末尾、印以及函等格式规定得以明确。唐宪宗时翰林学士李肇所撰《凡将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绫纸、所司印》记录了当时唐皇发给吐蕃、回纥、新罗等国国君以及吐蕃宰相、回纥内外相、南诏清平官等的外交文书的用纸、所司印、函的等级区别⁶。此外，唐昭宗时翰林学士杨钜撰写的《答蕃书并使使及宝函等事例》对于唐帝发给周边蕃国的外交文书的用纸、书头、末尾以及宝函的等秩区别等有详细的说明⁷。陆贽和白居易代唐皇起草的致吐蕃宰相、吐蕃将以及南诏清平官文书的用纸、印和宝函已无从查考，但书头均写作“敕○○”，文中及文尾均称对方为“卿”，唐帝居高临下的姿态是十分清楚的。

吴越国是唐亡后建立的、拥有内政和外交自主权的地方割据政权，其外交礼制应该参照唐代旧制，通过外交文书的书式明确己方与受书一方的身份关系。吴越王发给日本左、右大臣的书函均佚失不传，因而我们无法弄清函件的书头、文尾以及对于受书一方的称呼。藤原实赖和藤原师辅致吴越王的书函中分别有“伏惟大王”和“伏惟”之语，此类词语是下对上的敬辞，由此可见，实赖和师辅在书函中是将吴越王置于自己的上位的。此外，吴越王发给后百济王和后高句丽王的外交书函也可以作为参考，根据朝鲜史书《三国史记》卷五十《甄萱传》记载，后唐天成二年（927）吴越王钱镠曾分别致书后百济王甄萱和后高句丽王王建，劝两王修好。《甄萱传》中收录了吴越王致甄萱书的一段原文，文中称甄萱为“卿”，与此对应，甄萱和王建均将吴越王的文书称为“诏”⁸。可以断定，吴越王发往后百济王和后高句丽王的文书使用的是君对臣的体例。根据金子修一的研究，9 世纪的日本在以唐王朝的册封体制中与“诸蕃军长”同级，地位低于新罗⁹，推测 10 世纪五代政权对于日本的定位应该不会与唐朝有大的差异。后百济和后高句丽虽然是 10 世纪初从新罗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但不久即与新罗形成鼎足之势，而且得到了大陆政权的承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吴越王发给日本左、右大臣的书函决不会在书式规格上高于发给后百济王和后高句丽王的书函。

尽管吴越国始终将中原五代王朝奉为正朔，而且还向契丹俯首称臣，但是作为一个濒海大国，对于海东诸国则拥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旧五代史》记载：“（吴越）伪行制册，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¹⁰就吴越国对朝鲜半岛三国和海中岛国日本外交的政治意义而言，无疑与朝鲜半岛三国的官方交往更为重要，朝鲜半岛与大陆连疆接壤，在战略上可以与吴越互为犄角、彼此声援，而当时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在地缘政治上联系并不密切，吴越国对日采取积极、谦让的外交姿态在国际制衡中是没有多少回报可言的。因此，从 10 世纪的东亚国际关系的现实来看，木宫氏对于吴越对日外交姿态的推断也是难

¹ 陆贽：《翰苑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二别集类一。

² 陆贽：《翰苑集》卷十。

³ 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五十六，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 年。

⁴ 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五十七。

⁵ 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五十六。

⁶ 李肇：《翰林志》，《翰苑群书》卷一（见傅璇琮编《翰学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

⁷ 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翰苑群书》卷五（见傅璇琮编《翰学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

⁸ 《三国史记》卷五〇《甄萱传》，乙酉文化社，1993 年。

⁹ 金子修一：《唐代国际関係における日本の位置》，《隋唐の国際秩序と東アジア》第 7 章，名著刊行会，2001 年。

¹⁰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钱镠列传》，中华书局，1976 年。

以成立的。

事实上，可以确证的吴越国向日本正式的使节派遣仅有一次，即日本文献上记载的村上天皇天德元年（957）或天德三年（959）盛德言的访日。文献提及蒋承勋和蒋袞等人时直言其名，并不附记职衔，可见他们是以商人身份替吴越王和日本左、右大臣传递书函，充当的是信使的角色，而盛德言的持节使身份在文献记录中则是十分明确的。关于吴越此次遣使日本的意图，正如木宫氏核照《皇朝类苑》、《释门正统》等文献的相应记载所得出的推论那样，很可能是为了寻购散佚的天台典籍¹。

那么，吴越王与日本左、右大臣书函往来的目的何在？笔者认为，木宫氏以及国内一些研究者提出的“贸易利益说”夸大了吴越对于海外贸易的需求。无可否认，9—10世纪中日之间民间贸易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当时贸易商船的往来频度和贸易规模仍然十分有限。文献上记载的往来于吴越与日本之间的商船主要局限于蒋承勋船和蒋袞船，海商数量和赴日次数均远不及中日贸易全面展开的宋代。因此，我们不应高估对日贸易的收益在吴越国财政收入中所占份额，这时期吴越的航海贸易仍然应该以与大陆其他沿海地区之间的商贸活动为主。藤原实赖和藤原师辅的两封书函均是外交辞令的堆砌，没有言及任何涉及两国的具体事项，由此可以推知，与之对应的吴越王的书函也不会有任何实际内容，通函行为本身不过是一种非实利性的外交酬对而已。对于吴越王而言，可以借助这样的对外书函，作为中原王朝的代言人昭王德于海外，同时向“外夷”之邦宣明自身地位的正当性。

四、日本对吴越外交的姿态以及日本自体中心的“华夷秩序”的营构

上文提到，日本左右大臣与吴越国王的通函很可能肇始于日本左大臣主动致书吴越王，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关于10世纪日本的对外政策，是否仅以“消极”一词作为批语就可以终结进一步的探讨？公元10世纪在东亚国际秩序的历史变迁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以唐王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随着唐的覆亡土崩瓦解，中国大陆以及朝鲜半岛政治版图变得四分五裂。东亚国际局势的变动不可能不对当时日本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10世纪日本的外交举措，应该理解为其权力集团基于一种特殊的国际立场和政治意识形态对变幻不定的周边外部环境所作的反应，单从日本国民文化主体性的抬头以及贵族阶级的消极闭锁风气等方面是难以对其进行准确把握的。

在探讨日本对吴越的外交方针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8至10世纪初日本与唐王朝以及唐王朝册封体制之下诸政权的官方往来变化。众所周知，日本与唐中央政权的官方联系主要以遣唐使作为纽带，进入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唐末政局的混乱和遣唐使船的不断遭难，日本遣唐使最终废止，日本与唐王朝的官方交往随之断绝。在接受唐朝册封的诸政权中，与日本有正式官方往来的仅有新罗和渤海。但是，8世纪以来由于新罗力图改变对日本的贡使交往形式，两国外交关系逐渐恶化，公元779年双方彻底终止了使节往来。日本与渤海的正式官方交往始于727年渤海初次遣使日本，之后渤海的遣日使延续了近200年，合计达到34次，直至926年渤海为契丹所灭。渤海亡国之后，日本与大陆诸政权的官方交往完全告终。显而易见，8至10世纪初日本在外交上渐趋孤立，然而，其根源主要在于周边各国政治态势的客观变化，而不应归结为日本单方面采取消极的外交政策。

公元936年日本左大臣藤原忠平致书吴越王钱元瓘，是926年日本与大陆诸政权官方联

¹ 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流史》三、五代·北宋篇—第一章。

系彻底中断 10 年后一次出自高层的重要的外交行为，具有特别的意义。可以断定，日方由左大臣致书吴越王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对日方而言，吴越国一方面只是一个奉中原五代王朝为正统的一个割据政权，但同时又是一个实力不菲的航海强国，与吴越的官方交往既要保全己方尊严，又不能伤及对方体面，假如以天皇名义直接采取以上对下的格式致书吴越王，势必会招致吴越王的不满，由左大臣致书则可回避这一棘手问题。公元 930 年 9 月，醍醐天皇让位于皇太子，命藤原忠平以左大臣身份担任摄政¹，而当时太政大臣一职虚缺，忠平权柄最重，因此，936 年忠平实际上是以日廷首席大臣的身份致书吴越王的。公元 940 年，时任左大臣的藤原仲平又一次致书吴越王钱元瓘，是时忠平已经升任太政大臣兼摄政之职。虽然两次的致书者在名义上都是左大臣，但是第 2 次致书的左大臣仲平却并非首席辅臣。在此，致书人由摄政藤原忠平转为位居其次的藤原仲平，决不是一个随意的调整，应该是日方用意颇深的安排，因为将致书人设定于朝臣中的第 2 号权要，可以为化解吴越王复函的格式与己方理想的礼秩要求之间的矛盾留出更大空间。日方这一微妙的调整，不仅更利于在书信往来中保全体面，实际上也将本国对吴越外交的规格降低了一等。

公元 947 年，吴越王钱佐致书当时实际主持政务的藤原实赖，这是目前有据可查的第一封吴越王发往日本的书函。藤原实赖在当年刚由右大臣升任左大臣，虽然主管具体政务，但仍位居其父关白太政大臣藤原忠平之下。因此，即便钱佐的书函采取以上待下的书式，从逻辑上而言仍然不会与日方的理想礼秩发生抵触。公元 953 年，吴越王钱俶致书日本右大臣藤原师辅，此时太政大臣忠平已经故去，左大臣实赖为群臣之首，其弟右大臣师辅位居其次。吴越王的这封书函未发给曾经有过信函往来、是时已经成为政务主班的实赖，却又发给了当时日廷第 2 号人物师辅，恐怕决非偶然，推测此前日方很可能采取了其它外交举措使通函人转为师辅。无论如何，940 年以后日本始终由排位第二的权臣与吴越王展开“通函外交”，籍此将对吴越政权的关系框定在己方理想的礼秩体系之内。

实赖和师辅致吴越王书函均为无事务性内容，仔细品读两封书函中的应酬性辞令就会发现，其字里行间并非要传达一种对于双方交往的消极摒拒的态度，而是要贯彻一种宣明己方国体尊严的意图，而且这种意图在师辅书简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可以看出，两封书函的遣词用句都很费了一番斟酌，既显示出了己方的尊严，又顾及到了对方体面。实赖书函虽以“又所惠土宜，有憚容纳，既恐交於境外，何留物於掌中”之类辞令表现出一种矜持姿态，但是书函全文的笔调是相当谦逊的，文中出现“伏惟大王”、“吴越殿下”之语，将吴越王奉诸上位，并随书回赠沙金 200 两，全无失礼之处。在师辅书函中，“人臣之道”、“国宪”、“玉条”等相关表述几乎占据了全文内容的一半，其弦外之音无疑是在向对方言明天皇权威的至高无上，而“兰契”、“私恋”之语则似在不经意间将自己与对方的身份关系置换为了对等的友人关系，文末的“空望落日”云云，亦应暗蕴了己国为日出之国的自我抬扬之义。尽管如此，书状在礼数上并无疏漏，文末有“伏惟动履清胜”的恭敬之辞，又言“以小为遗，到愿检领”，附赠答谢物品。

通观 936 年至 953 年日本与吴越“通函外交”的过程，日方先以首席大臣出面致书，然后转以位居其次的大臣为发函人，而最后的藤原师辅书函，又较之前的藤原实赖书状在语调、姿态上均有抬升。不能不说，这些微妙的变化都是日方处心积虑进行安排调整的结果，借助“通函外交”的展开，日本使本国至上的外交礼秩在实际的国际交往中得以确认。在 10 世纪前半，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后百济政权亦有过通函交涉，与对吴越的通函外交一样，日方对

¹ 《日本纪略》延长八年九月廿二日条（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十一卷）。

于礼秩规格也有缜密的考虑。

929年,后百济王甄宣派遣张彦澄等人出使日本,张彦澄一行经对马至日本大宰府递交了公文和国信物,要求大宰府上奏己方的朝贡请求。大宰府答曰:“人臣无私,何有逾境之好,故狎存交通,春秋遗加贬之诫”,同时,大貳藤原扶幹在交付使者的答书中说:“所赠方奇不敢依领,人臣之义已无外交。”¹毋庸置疑,日方对于后百济的建交请求是持回绝态度的,笔者认为,这是日方鉴于当时朝鲜半岛的具体局势作出的决定,不能简单地以此作为日本采取了消极、闭锁对外方针的例证。929年正值后百济受到后高句丽的军事威胁,甄宣向日本遣使的真实目的在于以朝贡为代价换取日方的军事支持,在遣使日本的次年(930),后百济大败于后高句丽。就日本的立场而言,半岛局势动荡不定,作壁上观比较轻率介入更为明智。此外,自8世纪后半日本与新罗交恶以来,对朝鲜半岛的官方交往长期断绝,9世纪以来新罗海贼频频骚扰对马、壹岐和九州北部,日本对于后百济的建交请求难免怀有疑念。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将对后百济的交涉限定在大宰府的层面上来进行,无疑要比对吴越外交的规格低得多,而且,答书的发出人为大貳藤原扶幹,大貳只是大宰府的次官,其压低外交规格的意图不言自明。由此可见,日本对于吴越与后百济之间的关系洞若观火,并相应地在自身理念中的国际秩序里对后百济进行了定位。

根据上述考察可知,在10世纪日本官方的对外交往中,本国与交往对象国之间的等秩关系始终受到最大关注。事实上,8世纪以后日本就将合乎本国理想的国际等秩关系的确立作为外交活动的指针,这种等秩关系的原则就是日本中心的“华夷秩序”,而“华夷秩序”则根植于日本自我的“中华意识”这一思想基础之上。也可以说,自体中心的“华夷秩序”的营构是8世纪以后日本外交的主要目标,而“华夷秩序”的营构,在本质上则是一种使本国的“中华意识”贯彻、确立于现实的国际秩序之中的努力。下面想就此进行具体阐述。

关于日本“中华意识”的发萌,一般认为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倭五王”的时代。倭王武曾在478年向南朝刘宋遣使上表,在表文中言称己国“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²可见,当时倭人的思想中已经出现了“夷狄”概念。另外,在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发现的年代为471年的铁剑铭文中“有获加多支鹵大王寺,在斯鬼宫时,吾左治天下”³云云的文句,其中“治天下”三字尤为引人注目。川本芳昭认为,这里的“天下”是指倭国及其周边百济、新罗诸国,而倭王以治“天下”之王自居,体现了一种脱离中国册封体制的意识的萌动,而日本的“中华意识”正是在“天下意识”的延长线上发展起来的⁴。应该指出的是,古代日本“夷狄”、“天下”等观念是伴随着倭政权对周边的军事征服出现的,一方面这些理念是倭政权军事活动正当化的需要,另一方面倭的统合与扩张也使这些观念得以确立、巩固。

在倭王武遣使南朝一百余年之后的607年,遣隋使小野妹子向隋炀帝递上国书,“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⁵。这封国书一方面表达了日本试图改变对中国朝贡关系的欲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日本国内急于树立中央权威的迫切要求,因为国书产生的时代正是以圣德太子为首的日本统治者积极构建集权化政治体制的重要时期。然而,7世纪日本试图实现与中国王朝平等外交的努力,随着663年白村江之战日本-百济联军败于唐-

¹ 《扶桑略记》延长七年五月十七条和廿一日条。

² 《宋书》卷九七《倭国传》,中华书局,1974年。

³ 埼玉县教育委员会《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金象嵌铭概报》,埼玉县教育委员会,1979年。

⁴ 川本芳昭:《漢唐間における「新」中華意識の形成》,《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30号,2002年。

⁵ 《隋书》卷八一《倭国传》,中华书局,1973年。

新罗联军而告终。公元701年,日本《大宝律令》得以完成,天皇专制主义的律令体制确立。与律令的制定、扩充直至最终完成的过程相并行的,还有“天皇”称号和“日本”国号的采用¹。在日本律令制里,日本君主被定位为“皇帝”、“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律令条文里,包括唐朝在内的所有外国都被记作“蕃”(蛮)。因此,7、8世纪之交日本中央集权律令制国家的确立,标志着日本“中华意识”的完全形成。然而,这个时期日本的“中华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日本单方面的制度和理念之中,从现实的国际秩序来看,它充满了矛盾和空想,“中华意识”的贯彻和巩固,需要一个以册封一朝贡关系维系起来的“华夷秩序”与之互为表里。这样,营构本国中心“华夷秩序”就成为8世纪以来日本外交的主要目标。

日本“中华意识”遭遇的最大尴尬是对唐外交,这一点在遣唐使节的名分和对唐国书的形式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上,从8世纪初至9世纪中期遣唐使废绝为止,日本始终以内外两副面孔处理对唐事务,遣唐使对内是远赴唐国的天皇使节,对唐则行朝贡使之实,而来自唐帝的敕书均秘藏不宣²。日本对唐的官方交往,一方面有悖于日本中心主义的政治理念的实践,另一方面又是本国“中华意识”得以现实化的需要,因为遣唐使毕竟是输入中国物质与精神文化的重要渠道。

日本“中华意识”最稳定的现实支柱,是5世纪以来延续下来的中央朝廷与北部虾夷和南部隼人的关系,这些所谓“夷狄”的存在,使日本中心的“华夷秩序”至少在列岛范围得以成立。就与日本地缘关系最为密切的朝鲜半岛而言,7世纪后半,新罗灭百济、统一朝鲜半岛,同时开始谋求改变对日“朝贡”关系。进入8世纪中叶,随着两国交恶,日本“华夷秩序”的对应范围从朝鲜半岛退收出来。727年,唐的东北藩属渤海出于贸易目的开始遣使日本,日本则以“上国”姿态将渤海使作为贡使待遇有加,不惜牺牲大量国帑维持与渤海的往来近200年。日本对渤海的外交正是出于营构本国中心的“华夷秩序”的需要,与新罗关系恶化之后,日本竭力维持与渤海的官方交往,这对于8至10世纪之间日本“中华意识”的贯彻和巩固意义深远。

公元926年渤海为契丹所灭,日本失去了本国“中华意识”现实化的外在支点,但是另一方面,10世纪初唐的覆亡导致的东亚国际秩序的混乱,又给日本营构本国中心的“华夷秩序”提供了机遇。考察10世纪日本对外的实际举措,我们应该承认,10世纪日本外交政策取向的主导矢量,是日本朝野对于卷入周边诸政权变化无常的合纵连横的顾虑。然而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另一个逆向矢量,即日本权力集团利用唐帝国“华夷秩序”瓦解的时机营构自体中心的“华夷秩序”的欲图,可以说,对吴越的“通函外交”正是两个矢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通函大臣级别的设定、书函文句的精心斟酌和前后书函语气的微妙调整,恐怕很难解释为片面的“消极无为”的对外方针下的一种姿态和举措。总之,日本与吴越“通函外交”的一页历史,只有放在8世纪初以来日本“华夷秩序”的营构这一文脉中才能够准确理解。

¹ 山口修:《日中交渉史》6,东方书店,1996年。

² 东野治之:《遣唐使船》1,朝日新闻社,1999年。

国学与近世日本人的文化认同

湖南师范大学日语系 向 卿

在古义学、古文辞学“脱儒”乃至排儒之风的熏陶下，17、18世纪登场的国学，以复古为名，更是将反儒反佛这一倾向推到了极致。国学在思想上的表现是“脱儒”、“排佛”和“复古”。国学者以“破”儒佛之意和“立”大和魂为手段，企图恢复儒佛传来之前的古道，并以此对抗当时的中国。“排斥儒佛”意味着中国“华夷变态”秩序下的日本人“自我”与“他者”意识的进一步增强；而立“大和心”，即发现日本人共同的精神气质，则意味着日本民族精神的自觉，开始走上并又迅速完成了“同一性”（identity）的建构，而至本居宣长和平田笃胤，国学的政治性格更加浓厚，又开始强调日本对世界各国的优越性。这导致了日本近世以对抗中国为目的的民族主义的产生¹。三谷博教授也认为，“与中华帝国的对抗意识是日本民族主义形成的重要契机”，在此，中国是一个“不能忘记的他者”。²

与中国对抗而形成的日本近世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在我们看，兼有罗奇和霍布斯鲍姆所说的B阶段和C阶段，换言之，它须从两个方面来加以界定。第一，若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此时的民族主义还只是近世政治家、思想家等精英阶层的東西，即精英政治民族主义；第二，随着近世学问的普及，尤其是武士道的平民化和以“万叶精神”或“物哀”为支柱的“大和魂”的建立和泛化，使我们确信：至少到了幕末，日本人已形成了一个具有充实内容的文化共同体。在幕末，庶民即便对国家不表示忠诚，对“大和心”仍是体现出高度的认同和忠诚。因此，与中国对抗并超越中国就成为近世以来日本人的一个共同目标，这也是日本近代史发展的一条主线。可以说，日本近代的民族主义不是在幕末“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的，而只是在那种国际威胁下得到了强化而已，归根结底它是近世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东亚”内部自发生成的产物。因此，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随即也就走上了向东亚扩张的道路，以至于采取“失之西方，取自东方”的“进取”战略。

本文拟在民族主义形成这一视野和过程中，对日本近世国学的性格及其命运这一重大命题进行初步考察。

一、近世国学的性格

古典的儒教共同体的存在，造成了日本人“政治自我”与“文化自我”的长期分裂与紧张。对日本来说，儒教经典是他们文化的“故国”；但是由于他们毕竟身处日本，中国又是他们政治上的“异乡”。所以国学实际上就是为了消除这一紧张关系，即实现“政治自我”

¹ 罗奇和霍布斯鲍姆认为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产生可做三段式分析：A阶段纯粹是文化、文学与民风习俗的交融时期，其中所具有的政治甚或民族暗示，绝不会高出“吉普赛知识学会”这类团体所带有的色彩；B阶段，出现了民族主义的先驱以及诸多推动“民族概念”的激进派，同时，他们还大力鼓吹借政治手段来建立民族；C阶段，即民族主义纲领需要借助人民支持的阶段，或至少是民族主义者往往宣称他们拥有广大人民支持的阶段（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页）。我们认为上述分类完全适合于日本，依据有三：第一，近世以前日本处在中国型华夷秩序的影响之下，日本人形成了边缘文化心理的自卑意识；第二，国学成为了幕末政治运动的主要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第三，中国是近世日本的明确的“他者”。

² 三谷博：《明治維新とナショナリズム》，山川出版社，1997年，第22页。

与“文化自我”统一的近世最为典型的文学和思想政治运动。可以说，“异国”文化带给日本人的痛苦，最终只能在对异国文化的排斥和否定中得到解决。受外来文化影响之前的古代，就被看成了自然保持着协调的理想社会，在那里，人、神和自然浑然一体，所有人的欲求都能得到满足，一切都是最善的。最关键的是，这种理想社会还保留着日本人的纯粹性。这种思想就决定了国学运动是以一种对“古道和原乡（nostalgia）的探求”¹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日本的“他者”，从这个角度说国学实际上是对儒教的“反动”，是近世日本知识阶层试图从中国文化中独立出来、塑造自己的民族认同的努力。也正如上田贤治所说，国学“无外乎是为了自我认识、自我再发现、自我同定的学问”²。

“向原乡的回归”实际上是对祖先起源和祖先文化的“发明”和“创建”，是对历史记忆的唤起和知识化。祖先文化和历史的共有不仅是作为民族共同体的独特感的源泉，也连接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印度民族主义者巴纳吉曾经指出：“怀着崇敬之念走近你们祖先留下的神圣记录吧。千万不要忘记，你们学到的是受到尊崇的祖先的言行。正是有了它，你们今日的存在才被认同；正是有了它，时至今日欧罗巴的知识精英对你们的繁荣才寄以深切而热忱的关注。”³巴纳吉的话用浅显易懂的语言重新表述了民族主义者的文献的基本前提，即赋予民族（nation）以认同（identity）、意义和未来的的是它的过去⁴。即是说，在民族的形成期，为了民族的觉醒，对祖先历史的言及是最有效的。由于现在的文化通常都受到了外来文化的“污染”，所以在民族的创建阶段，对“纯粹的”祖先文化的回归便是唯一的方法。通常把有关民族性的思维方法加以体系化的主要是那些历史学家和诗人，他们也常常是从祖先神话、古代历史和诗歌中去发现民族性的依据。起源于和歌革新运动的国学作为“向原乡的回归”运动，就大量进行着所谓“传统的”、“纯粹的”文化的创建。从春满的《日本书纪》研究，到真渊的《万叶集》研究，再到宣长的《古事记》研究，国学者的研究领域几乎囊括了他们自认为体现了“日本精神”的所有古典文献。因此，它被吉野耕作称为“创造型”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原型（proto）⁵。

就国学的性格来说，松本三之介有过专门论述⁶。他认为国学的思想性格表现为三个方面：主情主义的人间像的形成、学问的性格和尊皇思想的特质。在我们看来，松本的划分很有见地但不全面，又割裂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难以把握国学的整体性格并分析国学各个层面的命运。我们认为，近世国学可分为作为文学运动的国学和作为政治运动的国学的两大方面。细分开来，文学运动的国学又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松本所说的“主情主义的人间像的形成”和“学问的性格”；政治运动的国学也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尊皇的神国绝对主义思想”和“排斥儒佛的日本至上主义思想”。国学的文学方面通常被认为是它的光明面，政治方面则被认为是它的阴暗面⁷。依我们看，由于国学一开始就是作为与中国文化的对立物而产生的，所以即便是文学的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因而也具有阴暗的一面。

国学的主情主义是素行、仁斋、徂徕等所构建的“人欲肯定论”的进一步发展，它的确

¹ 彼得·诺斯克（Peter Nosco）：《江戸社会と国学——向原郷の回归》，perikan社，1999年，第17页。Nostalgia一词最初出现是在17世纪末，当时为homesick之意，即指由于空间的隔离所造成的痛苦。后来，随着人类生活的复杂化，Nostalgia已不再单纯指空间的隔离感——“乡愁”，也开始指人的历史和时间的隔离感。

² 上田贤治：《国学的光与影》，《民族与文化的发现》，大明堂，1978年，第125页。

³ 转引自吉野耕作：《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社会学——现代日本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行方》，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7年，第60页。

⁴ 同上，第60页。

⁵ 吉野耕作：《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社会学——现代日本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行方》，第62页。

⁶ 松本三之介：《日本政治思想史概论》，劲草书房，1975年，第30-45页。

⁷ 上田贤治等就持这种观点，参见《国学的光与影》，《民族与文化的发现》，第116-125页。